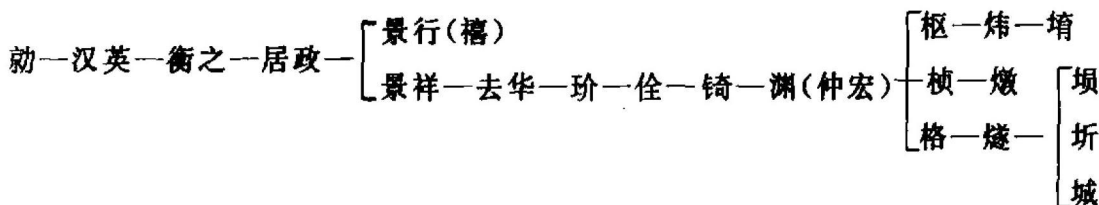


姚燧与刘致关系非同一般,而与王构则因观点分歧多有不合,刘致的记载更可靠些。(2)《姚燧年谱》称桢有子燧,若燧也是桢子,则与燧为亲兄弟,二者曾同在太原师从许衡,对于学友,姚燧文中多有提及,但却很少谈到燧,其他文献也鲜载二者关系,令人生疑。(3)《元史》也称格为燧父,可能当时另有他据今已不存,而今存的王构之文,《元史》却没有采取,因此不应轻易怀疑《元史》记载。(4)王构之文借《元文类》流传至今,历来治元史者想必对此并不生疏,却多不取此说,而以格为燧父,所以也不能草率地定桢为燧父。当然确定格即燧父还需进一步论证,尤其要有确凿的证据。

综上所述,现列姚氏世系简表如下: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

《登徒子好色赋》的语文学证伪

杨 琳

宋玉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说“宋玉赋十六篇”,但具体篇名不得而知。今传题名宋玉的作品有十六篇,《楚辞章句》有《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明刘节《广文选》有《高唐对》、《征咏对》、《郢中对》三篇,共计十六篇。其中只有《九辩》现在基本

上公认是宋玉的作品,《征咏对》、《郢中对》公认是后人伪托,《古文苑》中的六篇也大都认为是伪托,《招魂》大都认为是屈原的作品,《高唐对》分明是《高唐赋》的序言,是不能当一篇来凑数的,其余各篇人们疑信参半,或否或可,是非难明。本文想在前人的基础上论证《登徒子好色赋》出自后人伪托,是否在理,还请方家明鉴。为行文方便,以下将《登徒子好色赋》简称《登赋》。

前人将《登赋》判为伪托的根据主要有三。一是作品晚出,最早见于梁代萧统的《文选》,而两汉四百多年间从无有人提及或引用。二是从辞赋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它的体制、风格和语言与楚辞迥异,宋玉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三是直称“楚王”,明为后人假托之词。这几条证据虽然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坚实程度还是有些不足,所以不少人仍然信从旧题。下面我们再提供三条证据,庶几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明确化。

其一,《登赋》一开始交代说“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文选》卷十九李善注:“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显而易见,作者笔下“登徒子”是一个人名,自古以来人们也是这么理解的。“登徒”一名又见于《战国策·齐策三》:“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送之。”历史上也一直将此“登徒”当作人名。1978年6月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200余枚战国时期的竹简,上面有“左垚徒”、“右垚徒”的记载,裘锡圭先生首先指出,“左垚徒疑即见于《史记》的《楚世家》、《屈原列传》等篇的左徒”^①。嗣后汤炳正先生发表《“左徒”与“登徒”》一文,进一步指出“登徒”为“左登徒”或“右登徒”的省称^②。至此人们才明白“登徒”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官职名称。《登赋》的作者并非空穴来风,应是以有关宋玉与楚王的传闻为素材来创作的。但其时已不明“登徒”的本义,误以为是人名,便仿照“荀子”“贾子”之称而称为“登徒子”。《登赋》若是出自宋玉之手,断不会在官名之后缀以“子”的。

汤炳正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这个‘子’或系后人不理解‘登徒’的本义者所增加。因此,号称渊博典实的《文选》李善注把

作为官职名称的‘登徒’误为人的名称，不是没有原因的”。说“‘子’或系后人不理解‘登徒’的本义者所增加”是对的，但这“后人”不是别人，正是作者。汤先生没有从这官名误作人名的破绽去怀疑作者，反而猜测宋玉的原作后人有改动，缺乏根据，未近事理。就《登赋》原文而言，李善的注并没有错。

其二，《登赋》中说：“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增”“减”相对为文，这种语言现象先秦未见。先秦典籍中一般用“损”“益”对举来表达。如《易经·损》：“弗损，益之。”《彖传》：“损下益上。”又：“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老子》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季氏》：“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管子·明法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此例中“益长”“损短”的说法与《登赋》“增……长”、“减……短”的说法近似，但用“益”“损”，不用“增”“减”。《庄子·秋水》：“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荀子·大略》：“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又《荣辱》：“谨守起数，慎不敢损益也。”《周礼·夏官·司士》：“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礼记·三年问》：“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都是“损”“益”对举。有时也“加”“损”对举。如《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增”“减”对举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文献。《汉书·律历志上》：“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诗经·小雅·伐木》“终和且平”郑笺：“以可否相增减曰和。”后世沿用。如《后汉书·虞诩传》：“孙宾减灶而君增之。”《登赋》“增”“减”对举，说明它是东汉以来的人创作的，战国时期的宋玉是不会说这种话的。从王逸《楚辞章句》不录此文推断，其创作应在王逸之后。

其三，《登赋》与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如出一辙。请看下面比较：

结构	美人赋	登赋
缘起	邹阳在梁王面前说相如好色	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说宋玉好色
过程	相如辩说不好色	宋玉辩说不好色
辩说细目	1. 东邻美女“登垣而望臣，三年于兹矣，臣弃而不许”。 2. “命驾东来，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 3. 遇一美女，相如抚琴而女歌。 4. 美女“时来亲臣”。 5. “心正于怀”，“秉志不回（邪）”。	1. 东家美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 2. 章华大夫“从容郑卫溱洧之间”。 3. 章华大夫遇一美女，与之对歌。 4. “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 5. “扬诗守礼，终不过差。”

由上可见，《登赋》与《美人赋》从结构到细目基本一致，前者显然是仿袭后者而成。

《汉书·外戚传上·李夫人》载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有人认为“倾城”“倾国”典出《登赋》。并说：“汉武帝时代宋赋中已有此《登徒子好色赋》一篇，而为汉武帝及李延年所共见共晓；而今传之《登徒子好色赋》恐不可轻易非之矣。阮籍《咏怀》第二首曰：‘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用典亦来自宋赋，所见之宋赋，也和李延年、汉武帝所见者为同一篇。然则，此赋由来甚久，盖可断言。”^③此说非常牵强。《登赋》中仅说“惑阳城，迷下蔡”，这怎么能看成是“倾城”“倾国”的出典呢？“倾城”语出《诗经·大雅·瞻仰》的“哲妇倾城”，“倾国”语见《晏子春秋·谏上十》：“此离树别党，倾国之道也。”原义是说倾覆城郭邦国。李延年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意思是说别人见到这位佳人，将不惜攻城灭国也要得到她，极言其美。后世遂以“倾国倾城”形容佳人之美。李延年有“倾城”“倾国”这样的字眼，是含有讽谏之意的，所以歌中说“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城倾国破，君主自然再也得不到佳人了，讽谏之意很明显。李诗的含义既是如此，那么说它典出《登赋》实在不着边际。阮籍(210—263)的《咏怀》诗确实用的是《登赋》中

的典,但这只能说明《登赋》的出现不晚于魏晋时期,无从断言“此赋由来甚久”,更无从证明此赋的作者就是宋玉。恰恰相反,一篇战国以来即已行世的妙文直到魏晋之际才见有人引用,岂不是匪夷所思的事?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登赋》是后人伪托于宋玉名下的,其写作时代应在王逸之后,阮籍之前,即约在公元二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三世纪初。

注:

①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年7期。

②收入《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

③郑良树《论〈宋玉集〉》,《文献》1995年4期。

作者工作单位:烟台大学中文系

《补〈全金元词〉二十九首》商榷

谢 创 志

《文献》1998年第1期宁希元、宁恢《补〈全金元词〉二十九首》一文,(下简称“宁文”)搜罗金元人佚词,补《全金元词》之未备,贡献不少。笔者拜读之后,发现有两首实系误补及其他琐细的问题,特列于下,与宁先生商榷。

“《木兰花》(淮山隐隐)”,宁文据《续夷坚志》卷四《泗州题壁词》补作金无名氏词。

创志按:《续夷坚志》(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泗州题壁词》云:

兴定末,四都尉南征,军士掠淮上良家女北归,有题《木兰花》词逆旅间云(词略)。

题词之人应是被军士所掠的淮上良家女,有原词可证:“淮山隐隐,